

闽西与闽台客家关系

闽西是一区位的名称。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观照,闽西的区域包括古代八闽最西端的州郡——汀州和现在福建最西边的地市——龙岩,具体地说,就是长汀、宁化、上杭、武平、连城、永定、清流、明溪八县和新罗区与漳平市的总和。这里是福建客家人聚居并最多的地区,但福建的客家人还有散居于与闽西相邻的漳州市南靖的梅林、书洋,平和的九峰、芦溪,以及诏安的官陂、太平等乡镇。全省客家人约400万,与台湾客家人总数大致相当。

闽西与台湾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因为从表象上看,台湾民众以闽南人为主,而台湾客家又以粤籍为多,所以,在人们通常印象中,闽西与台湾的关系似乎并不显得突出。但是,如果以寻根问祖并结合闽台客家关系来审视,闽西与台湾的关系却远远超出世人的成见。

一、闽西与台湾姓氏的宗亲渊源关系

台湾有不少姓氏或其成员与闽西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这些姓氏或其组成人员中,尽管只有部分由闽西直接迁台,但其他的祖先都曾徙居过闽西,其中特别是绝大部分原籍为粤东和部分原籍在闽南的人氏,他们的祖先都曾是闽西的主人,甚至有的至今还与今日闽西相关姓氏共奉一个始祖,所以,闽西有他们斩不断的根和梦萦的魂。

一、闽西迁台的主要姓氏成员

台湾闽西籍人口约 70 万。^① 这部分人中,究竟有多少个姓氏难以统计。1980 年,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编印出版了一本《台湾区百大姓源流简介》(以下简称《简介》)。其中所列 100 个姓氏,钟、锺两姓资料同一,金、陆、倪、夏、童等 5 姓则因“资料未详”或“文献不详”而未注明其去台原籍,所以,真正有“源流”者实为 94 姓。在这 94 个姓氏中,有明清时期由闽西直接迁台的主要姓氏 27 个,即:林、黄、张、李、吴、刘、谢、曾、徐、苏、吕、江、高、钟(即钟、锺)、游、胡、沈、余、卢、魏、范、温、冯、石、邹、巫、阮,占 94 姓的 28.7%。毫无疑问,《简介》所记姓氏的原籍是以其人口在该姓氏中有一定数量为依据,不然,书中将载明台湾有更多的姓氏有原籍为闽西的成员。如据闽西练、饶、詹、翁等姓族谱记载,这些姓氏在明清时期就有人迁台而成为台湾相应姓氏的成员,而它们在《简介》中都未加以注明。所以,如果有条件全面深入地普查和统计,有闽西籍成员的台湾姓氏必定远远超出 27 个。

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据《简介》统计,在这些有闽西籍人的 27 个姓氏中,江、钟、游、胡、邹、巫等 6 姓的闽西籍人数,在台湾为福建各地迁台相关姓氏人数之首。也就是说,在今日台湾的这 6 个姓氏中,闽西籍人口占了相当的比例。

除与早期迁台的闽粤人氏一样喜将自己开发的地方冠以故里的地名之外,闽西各姓迁台人氏还有将自己开辟的地方和创造的事物附上自己姓氏符号的特点。如台湾的新竹、台中、南投、云林、嘉义、花莲、台南等地都有吴厝里或吴厝巷,据考为南宋末年开基并歿葬于龙岩小池的吴承顺裔孙渡台留迹于当地后所取的名

^① 日本总督府于 1926 年对台湾人祖籍调查的结果是,祖籍为汀州府的人口 8.5 万,龙岩州的人口 3.26 万,即闽西籍人口为 11.76 万。当时台湾总人口为 375 万,现在台湾人口比 1926 年增加 5.7 倍,为 2130 万,因而闽西籍人也相应增长至 70 万(其中 1945—1949 年去台的约 2 万闽西人的增长数与在台外省人成分未作考虑)。

称；^①又如长汀籍翁氏在新竹有一个可灌田四百余甲（每甲相当于十一亩多）的渠圳，业户把它命名为“翁厝圳”。^②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早期渡台的闽西籍人氏具有慎终追远、眷恋祖先和故里的情结，同时也为后人认识闽西与台湾密切的宗亲渊源关系提供了又一方面的重要依据。

二、台湾粤籍客家与闽西的渊源

广东是客家人最多的省份。台湾客家也以原籍广东为主，其中原籍为古嘉应州的客家人，即占了台湾客家人总数的二分之一。^③所以，人们谈起台湾客家的来源，往往都会联想到粤东。然而，广东特别是粤东的客家，绝大多数与闽西有宗亲渊源关系，他们的祖先在入粤以前，基本都有徙居闽西的历史，正如英国教士艮贝尔于1912年所著《客家源流与迁移》中所说：“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来自福建宁化县的石壁村。”另外，梅州客家联谊会和梅州市方志办曾参照摘录近50种梅州姓氏族谱及有关史料，编印一本《客家姓氏渊源》（第一集）。该书汇集或整理了梅州34个姓氏渊源史料，其中表明至少有刁、王、丘、伍、李、何、沈、吴、林、范、姚、徐、黄、陈、张、郭、曾、汤、杨、刘、邓、黎、卢、钟、缪、谢、魏、罗、肖、蓝等30个姓氏的祖先曾徙居过闽西，并且这些姓氏几乎都把由闽西迁粤的那代祖先奉为开基始祖。如丘氏，其所录《梅县丘氏族谱传序》载：

“河南丘氏，先世自东晋五胡云扰，渡江而南，入闽南而汀（州）之宁化石壁。迨丘氏祖三五郎，由宁（化）迁居上杭太拔城前，歿后葬于上杭县黄岩屏凤镇，有子十人，三、六、八郎早逝，惟七人盛传。七人中，伯七郎生三子，名继龙、从龙、梦龙。

① 龙岩市台办编《寻根揽胜闽西缘》，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清样），第85页。

②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81页。

③ 陈运栋《客家人》，台湾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继龙生三子，名惟成、惟福、惟禄。惟成即南坑之祖，惟福即程乡（今梅县）之祖；惟禄即林塘之祖。”

再如林氏，《渊源》录《蕉岭林姓族谱》记载：

“入闽二十二世林显荣，字清香，居汀州府清流县石壁村林家城（清光绪时改为石壁塘李家庄）……南宋末年避乱，居大埔县大麻，为大埔开基祖。明中叶，其七世孙隐叟公始迁蕉岭南山下。”

又如张氏，其《兴宁张氏族谱》所附“清河都神冈社张氏族谱序”云：

“按我开基祖考小八郎公，妣彭氏，原籍福建汀州宁化县，中琴堡居焉。宋末阳季之秋，广寇作乱，惠潮嘉之民，十无一、二，田无业主，宅无人居，我祖十九郎公，妣陈氏，生八子，由兄弟八人俱至广东分别各住。小八郎公即入居潮州府之古梅州，今为程乡县怀仁乡石窟都神冈社。”

更有甚者，这些姓氏或其支脉还与今闽西相关姓氏共奉当年最初入闽的祖先为始祖或一世。如沈氏，据《梅县沈氏族谱》载：

“一世 廷辅，南宋高祖宗时随父入闽，住汀州府。”至六世万三郎、万四郎、万五郎后，分别移居大埔、梅县、平远等地。再如范氏，据《大埔范姓族谱》载：

“一世 坤，字详，官任龙图阁大学士。唐僖宗元年，因乱，家口十八人居浙江杭州钱塘，后移南剑州沙县孟阡峡，再徙福建汀州宁化黄竹迳开基。”至九世滋丈千二郎，居上杭，生十子，名伯一郎依至伯十郎。其中十世伯四郎裔孙迁广东嘉应州；伯五郎居程乡松口牛角塘；伯九郎居广东程乡；伯十郎迁潮府海阳县，生大一郎移居大埔长治堂坪。

因此，广东特别是粤东客家在宗亲渊源方面，与闽西有着不可分割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其中闽西为源，粤东为流。既然如此，台湾粤籍客家与闽西客家无疑也是血脉相连。

三、台湾闽南人与闽西的关系

如果说闽西与台湾粤籍客家的关系因为同祖同源,并且两者同属于一个语系而易被人重视和认识的话,那么,闽西与台湾闽南人的关系却相对不引人注目,因为两者不仅不同一个民系,而且在台湾史上每逢“闽人”(主要指闽南人)和“粤人”(主要指广东客家)发生纠纷甚至导致“械斗”时,闽西籍人基本都同情并接近“粤人”。所以,从表象上看,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然而,如果追本溯源,不少闽南姓氏的组成人员也与粤籍客家一样,其祖先都曾徙居过闽西,甚至有的还与闽西相关姓氏成员有密切的宗亲渊源。

绝大部分闽南人甚至有的学者根据野史方志的记述而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闽南姓氏是由唐代陈政、陈元光父子征戍漳州时的随从官佐士卒,以及五代王绪与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经营时所率河南光、寿二州移民所传。这种认识,如果仅从闽南姓氏的数量形式而言大体不错,但若认为每个闽南姓氏的组成人员都是唐和五代陈、王部属的后裔,则与事实不大相符。实际上,闽南各姓氏成员除由先于客家先民入闽者或自成一体入闽的唐和五代陈、王部属所传外,还有相当部分是由与客家姓氏一起自赣南入闽的姓氏所传。这部分闽南先民自中原南迁,直至迁徙到赣南和闽西的宁化、长汀、龙岩或上杭(明成化后还包括永定)还与闽西人同祖同源。在此,我们且不论诸如张、简、肖等生活在与闽西相邻并操福佬和客家双语的闽南主要姓氏的许多成员,其本身至今就还未完全脱胎换骨成闽南人,就是那些标榜为陈元光所属后裔的姓氏,其成员也不少与闽西有密切的宗亲渊源。如陈氏,据漳州平和芦溪《陈氏族谱》载:

“许家高阳县,薛家河东县诸子孙并是亲生骨肉不得为婚……陈崇公兄弟五人又望转汀州宁化县住,陈公在地名后寮

坑住下,生下二男:一公陈俭……二公陈爵……俭生三男(都徙于闽西、粤东——引注)……爵生有五男:一公陈仲四郎流漳州府漳浦县大坑住;为考公二公陈仲四五郎流漳州府南靖习贤里竹围住;(三公、四公仍徙居闽西——引注)……五公陈仲八郎在原宁化石壁住,有五男分流……祖徙住芦溪者间又分五房。”^①

再如有“闽台陈林半天下”之称的林氏,据南靖林雅《西河九龙族谱》等载:

其一为宋代第三十八世德公,进士,为宁化知县,宋末不回中原原籍而居宁化石壁为始祖,后裔有流入闽南者,有成南靖林雅、金山等支派。^②另一入闽祖讳靖,“光州固始人,今吾之林从闽汀来……散落漳潮惠间。”^③

又如赖氏,据南靖《梧宅赖氏族谱》载:

赖氏原居宁化石壁田心村,“世人皆呼为田心赖,自宋及元至大明洪武二年,闻朝廷开漳泉惠潮,招集新民,我宁化朝美公,婆许、马、黄氏生下九子,名唤荆、梁、雍、豫、徐、扬、青、充、冀,长次三同嫡母马氏来漳泉开基;四五六同次母许氏住惠潮作祖;七八九同三母黄氏在石壁看守祖祠坟墓。”^④

因此,据有关人士考证和统计:与闽西有这种宗亲渊源关系的闽南姓氏有70余个;^⑤而现在台湾闽南人中则有300余万人的祖先曾徙居过闽西宁化石壁。^⑥所以,闽西与闽南人的关系远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密切。

① ②③④引林嘉书《对“客家迟来”说的再研究》所引摘相关姓氏族谱资料。

⑤ 林嘉书《对“客家迟来”说的再研究》,谢剑、郑赤琰主编《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

⑥ 林嘉书《闽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二、闽西客家迁台的时空形态及原因

由于受历史和区位的影响,闽西客家迁徙台湾在时空形态上表现出明显的特征,而且决定这种形态特征的主要因素在政治、经济、地缘和社会等方面各有侧重。

一、闽西客家徙居台湾的时序形态及其原因

闽西客家徙居台湾始于何时无从可考,但至迟于明代即有人渡台开基,如连城庙前芷溪村黄姓三世邓斌公,赴台开基至今已逾600余年。^①然而,闽西人大规模渡台则在明末清初郑成功驱荷复台至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之时,其间大致细历了三次阶段性的移民浪潮。

1. 第一次移民浪潮——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台时期

明永历十三年(1659),明将郑成功在南京与清军决战失败,见明朝亡于大陆已成定局,遂决定全力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达30余年之久的台湾,以为立足之地。永历十五年(1661)三月,郑成功亲率2万5千大军,分乘200余艘船舰从金门料罗湾启航,经九个月半月奋战,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并退出台湾。郑氏在台仍奉朔称明永历,并以赤嵌为“东都明京”,以明其抗清复明之志,历时达22年(1661—1683)之久。

客家素有崇正心理,普遍有反抗异族压迫的意识,所以,从明崇祯末年(清顺治初年)开始,客家地区抗清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闽西、粤东一带,由于南明政权曾相继建立于此,并有余部及宗室在此抗争,因而抗清复明烈焰遍地燎原,不仅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而且从官吏士子到一般乡民都有不少卷入这场斗争。^②清廷

^① 龙岩市台办编《寻根揽胜闽西缘》,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清样),第54页。

^② 简启梅《顺治年间闽西客家抗清斗争述评》,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客家纵横》32开本,第一辑。

对其镇压也极其残酷,如为镇压“武平所民王道一、徐文海”领导各乡义民万余人抗清,从顺治三年至五年连续屠城三次。^①而这时直至明郑立足台湾,郑氏集团一直在闽台坚持抗清,并广纳内地移民赴台。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是,郑成功心腹大将并于郑成功死后由其子郑经嗣位后主掌明郑军务的刘国轩乃闽西汀州人氏。他在清康熙前期乘三藩之乱,经常亲自率兵进攻闽南、粤东甚至直入闽西,^②所以,闽西与粤东客家抗清组织多与其有联系,^③如永定苏逢霖、大埔江龙等所率义军即与明郑相呼应,其中江龙后来还成为明郑之镇将。^④在这种形势下,闽西客家追随赴台者自然不在少数。这一历史现象,不仅两岸史家和客家研究者已有一致认识,而且在闽西和台湾客家有关姓氏族谱中也有具体记载。如江氏,据永定高头《江氏族谱》和《台湾江氏大族谱》记载:

永定开基祖江添澄长子继富(10世),派下18世“秋贵、阿龙(即《台湾江氏大族谱》所载“阿龙渡台祖”)往东都。”“19世魁妹二子去东都”,另外,18世江汉鼎、江汉壮兄弟也于此时去台。

又如魏氏,据《武平魏氏族谱》记载:

元代开基于武平的魏侃夫,传至15世魏伟生,有六子名鼎龙、玉龙、成龙、伯龙、飞龙、夫龙,第五子飞龙于“永历十五年”(即郑成功收复台湾当年)适居台湾桃园音潭乡开基。在此前后,还有13世龙昌,14世洪恩、圣受、盛受,15世光英,17世勤创、雨来、粮连、路连等相继渡台,徙居于桃园、苗栗等地垦荒。

所以,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期,由于受政治和乡亲刘国轩等的

① 邱复主纂《武平县志》(民国30年版)。

② 连横《台湾通志》“刘国轩传”。

③ ④ 简启梅《顺治年间闽西客家抗清斗争述评》,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客家纵横》32开本,第一辑。

影响,闽西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迁徙台湾的移民浪潮。

2. 第二次移民浪潮——清康熙中叶至中日甲午战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平定台湾统一中国,但在平定台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施琅将军以去台者多“积年贫穷游手罔作者”,“恐至海外诱结党类,蓄毒酿祸”为由,建议清廷“暂禁开海”,并请严禁客人渡台。奇怪的是,这些奏请竟都被清廷准许。然后施琅颁布“移民三禁”,即:1. 渡台者必先给原籍地方照单,并经两岸海防稽查审验批准;2. 渡台者不许携带家眷;3. 严禁粤东一带客人渡台。可见对大陆特别是客家渡台者十分严格。所以,这一时期闽西渡台人数锐减。这种状况持续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施琅去世,禁令才逐渐松弛。

客家多处山区,山多田少,以致农产不丰,经济落后,加上人口增长迅速,人民生活历来比较贫苦。象闽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宋《临汀志》载:“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康熙《永定县志》亦载:“(永定)俗俭而风朴,地瘠而民贫,崇山复岭,旱潦频年又苦于催科。”民国《武平县志》则载:“武邑处万山中,无巨川为之贯注,故山田多苦旱,然涧溪交错,遇溪雨,山水暴至,又易为民害”,“旱潦不时,民将乏食。”这些等等,都说明闽西历史上生存环境恶劣;加上清代中期人口出现空前暴涨——据史料记载和有关人士统计:汀州府人口在宋末元初不足 24 万,但到清道光九年(1829)已涨至 155 万。^① 因生计所迫,海禁开放之后,闽西赴台者络绎不绝。这一移民现象,在有关史籍和族谱中反映得十分热闹。以永定为例,如下洋胡氏,据民国十三年修《胡氏族谱》记载:这一宗族从康熙年间就有不少人移台,其中从开基祖万七郎公所传第 17 代至 25 代渡台定居者共 209 人,而于乾隆初年去台的胡焯猷还成为

^① 葛文清《唐宋汀江流域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述评》,龙岩地区社科联主办《闽西社科研究》1992 年第一期。

台湾农垦与教化先驱之一；再如下洋谢氏，据洋背《谢氏重抄族谱序》载，从15世于乾隆年间始至20世于清末（记止1904年），迁台者有42户；又如高头江姓，据当地东山、南山、北山各村族谱记载，仅22世（约19世纪初）前去台者就达460余人，其中一家兄弟三四人、五六人全部去台的很多，还有父子在台，祖孙去台的，也有父亲去世后母亲携子去台的。^①此外，当今台湾永定籍政要李登辉、吴伯雄等，其祖上也是分别于乾隆和咸丰时期去台，其中李氏上祖据永定湖坑《李氏族谱》记载，在雍正、乾隆年间去台者就达221人……这段时期闽西去台者除一般平民外，还有不少清朝派往台湾的驻守军人。如康熙年间分别有长汀人林富和永定人吴升任台湾南路营把总；乾隆年间有长汀人曾绍龙任鹿仔港左营游击，漳平人尹贵任北路营把总、长汀人吴见龙任千总；嘉庆年间有连城人吴孝林任台湾北路千总，长汀人童聪超任台湾府千总等等。这些军人不少在解甲后留在当地开基立业。^②

闽西客家第二次徙居台湾浪潮，由于主要受生存欲望的驱使，加上时间横跨200年之久，因而比起第一次移民浪潮更为剧烈，至今在台的闽西籍人氏即大多为这一时期移民的后裔。

3. 第三次移民浪潮——二战结束至国民党退据台湾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在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列岛。从此，闽西人移迁台湾转入低潮，甚至还有一些原居台湾者因不入日本籍或从事爱国活动而被驱出台湾。这种状况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强占50年之久的台湾才归还中国。从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① 苏志强《高头江姓人迁台述略》，永定县政协文史委主编《永定文史资料》第15辑（1996）。

^② 龙岩市台办编《寻根揽胜闽西缘》，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清样），第53页。

立而国民党败走大陆，闽西客家又掀起一次移居台湾的浪潮。

在这次闽西人氏移民台湾的浪潮中，主要由前期随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和后期随国民党胡璉兵团残部退离大陆这二波移民组成。在前一波移民中，最主要的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个领头人物——李友邦与张文成。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著名台湾爱国人士，曾两次参加袭击海山郡日警派出所，后潜回大陆，在闽浙赣等地号召台胞“保卫祖国，收复台湾”，并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金华沦陷后，义勇队移居闽西龙岩，当地青年踊跃参加，使队员一下从165人增至381人，其中苏禄洲、章仕开、林忠元、苏振文、苏年湘、谢启武、郑炳尧等，都是李友邦在岩所办三期“干部训练班”的首批闽西籍少尉队人员。抗战胜利后，台湾义勇队开赴台湾，同去了不少闽西籍队员。而龙岩东肖籍的张文成，则在台湾光复后奉派接收日据时的花莲港厅。国民政府成立花莲县政府，他首任县长。张文成赴台时，第一批就从龙岩带去了100多名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受这些人影响，以后闽西人赴台络绎不绝。

后一波移民主要是受胡璉兵团溃退大陆的影响。1949年7月，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战败而突围的国民党胡璉兵团从赣南进入闽西，一路拉扶抓丁补充兵员，并在永定、上杭等县驻扎一个多月，成立“闽粤赣边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和“永定善后委员会”等组织，招募社会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然后撤离闽西前往广东汕头退至金门、台湾。在这次有目的、有组织的军事行动中，跟随和被抓的闽西人（大多是青壮年）达近万余人，他们到达台湾后，除部分转入政界与商界外，大多退役后成为台湾所谓的“荣民”。此外，在这一时期，在国民党其他部队服役的军人退台者也不在少数。加上这些人士，在1949年去台的闽西人共12000余人。

在第三次移民浪潮的成员中，不少人成为当代台湾社会的要

人,如位列国民党军队陆军上将的罗列,曾任台湾省中医师公会首任会长和台湾“环岛铁路兴建促进会”主任委员等职的郑品聪,台大教授、“考试院”委员卢衍祺,以及实业家罗天照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去台的。

二、闽西客家徙居台湾的空间形态及其原因

闽西客家徙居台湾,无论是离开原籍的区域,还是抵居台湾的分布,都呈现出明显的特征。了解这一现象,对于研究客家问题和台湾移民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1. 去台者以永定、武平为主

在今台湾约70万闽西籍人口中,以原籍为永定、武平两县最多。这一现象饶有兴味,因为漳平市和新罗区(原龙岩县)原属漳州府,并位于九龙江流域,但它们的去台人氏却远不及前者。据台湾各姓渊源研究学会编印的《台湾区百大姓源流简介》显示,明清时期有由闽西直接迁台的27个主要姓氏中,有含永定的达20个,他们是:黄、吴、刘、谢、曾、徐、苏、江、游、湖、沈、余、卢、范、巫、阮、林、张、魏、李。其中前16姓中,在闽西还只永定独有(实际为占主导);由武平直接迁台的姓氏则有5个,他们是:张、钟、魏、温、冯。其余各县、市、区最多才两个(上杭与新罗),而清流、明溪、连城、漳平等四县、市则不在统计之列。

构成这一有趣的人文现象,主要是由当时受自然和政治因素制约而形成的特殊渡台途径,以及地缘区位的影响所致。清朝时期,大陆人民去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走政府规定的官道,即大致从原籍领取照单到厦门查验,而后放洋到澎湖的妈宫(今称马公)等港候风,然后向东南行驶,经东吉洋进入鹿耳门查验,再由安平登岸到达府城(今台南)附近寓居;另一种是偷渡,即由原籍到闽南、粤东沿海搭乘小帆船,趁初夏的西南风,或在七月、十月风势较稳时向东北进发至台湾南部西南岸,遇到汛兵疏于防守或买通

时,就在各小港口直接登陆。^①然而,如前所述,闽西客家渡台本是多因生计所迫,走官道需要钱,而且手续麻烦,因而大多选择偷渡,所以,他们离开大陆赴台时,靠粤东者往往顺汀江——韩江南下至汕头入海口,靠闽南者则步行至漳浦、厦门一带海岸。

闽西武平因与粤东的蕉岭、大埔相接,并且同属纯客家县,语言风俗相同;而蕉岭是粤东去台最多的县分之一,至今台胞达40余万,超过原籍人口20万的一倍。受此地缘的影响,武平渡台者自然甚众。至于永定,它既与闽南的南靖、平和相接,又与粤东的大埔相连,并且与大埔之间有汀江下游沟通,闽南、粤东两地渡台的有利条件都可沾边,所以,去台者在闽西各县最多便不以为奇。

2. 居台者处山地丘陵为多

在台各族群的分布,素有“泉州近海,漳人居中,客家近山”或“闽(闽南人)海、粤(客家人)山”之说。现实状况虽然不这么绝对,但从目前台湾客籍人士多聚居于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屏东、高雄、花莲、台东等县山区来看,这些说法还是大致勾勒出了客家在台分布的轮廓。闽西籍客家在台分布,与此说法也八九不离十。

这一人文现象的形成,主要有两大方面原因:一是在主观上,客家人在大陆时主要居住在丘陵山地,生活习性不以航海捕捞见长,而是以农垦耕种为主,他们徙居台湾不可能马上放弃原乡的生活传统,只能承袭以山地开垦和农作物种植的职业,所以,他们一到台湾,就自己决定了居住环境多在山区的命运;另一重要因素是,在客观上,客家人徙居台湾迟于闽南人,而且人数不及后者,特别是语言文化与闽南人不同,因而常受闽南人歧视、排挤甚至发生械斗而退居山区。这方面现象,不少史籍和研究都有反映,如康熙五十五年陈文达编纂的《台湾县志》记载:“台(指台湾县)无客庄。”

^① 陈运栋《客家人》,台湾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第97~98页。

客庄,潮人(指粤东潮州府客家)所居之庄也。南路自淡水溪而下,类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庄亦称客庄。每客庄至数百人,少者百余人。漳泉之人不与焉,以其不同类也。”作为闽西籍客家,因其语言习性与粤东籍客家相同而属“同类”,自然也难被闽南人接受而愿与粤东籍客家相处,因此,他们在台湾基本与粤东籍客家融为一体而多居于山地丘陵之地。

三、闽籍客家在台湾的历史功绩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推动台湾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主要是作为炎黄子孙而移居台湾的闽南语人和客家人。福建特别是闽西籍的台湾客家人作为台湾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无疑在台湾史上留下他们应有而独特的成就和功绩。

一、维护祖国统一

在中国历史上,台湾曾两次被外国侵占。一次是明天启四年(1624)荷兰人侵入,在岛上建赤嵌城,实行殖民掠夺,直至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据台才得以光复;另一次是1895年清朝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而割让台湾给日本,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回归祖国怀抱。在台湾两次被外国侵占时期,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台湾的光复和祖国统一,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福建特别是闽西籍台湾客家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和钦佩。

闽籍客家在第一次光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最为耀眼的人物是长汀籍人士刘国轩。他随郑成功因“为将,爱士卒,信赏必罚,而出奇制胜,众莫能测,故每战得捷,败亦能完,诸将皆莫及也”而成为郑成功心腹大将。^①郑成功死后,他主掌明郑的军务。

^① ②连横《台湾通志》“刘国轩传”。

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率大军赴台驱荷,刘国轩作为先锋大将,率领将士冲锋陷阵,勇猛顽强,无往不克,连荷兰据台总督揆一也不得不承认其所率将士“不顾死活地冲入阵地,十分凶猛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然而,更显其英明大义之处,则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进攻台湾时,能审时度势,以明郑最高军事长官身份,“与文武议奉克璘(郑成功孙)以降”,^②使清朝更为顺利地实现了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因此,在台湾第一次光复及其与大陆统一的民族大业中,刘国轩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所以,连横著《台湾通史》,在“列传”中有刘国轩专传,而且篇幅比其他列传人物重要,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第二次光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因其时间更长和更为艰巨,因而闽籍客家参与的人士更为广众,事迹也更为感人。就群体而言,最著名者为台南屏东的“六堆”抗日。“六堆”的名实,本缘于康熙六十年(1721)台南一带客家人为应付当时与闽南人磨擦的客家准军事组织。据刘正一《台湾南部六堆客家发展史》阐述:“凤山下淡水自康熙中叶来,素有闽之漳、泉、汀三州与粤之潮州人开拓成庄。闽之漳、泉与潮之海阳、潮阳、揭阳县民,因语气相通,故和睦和处。而潮州所辖镇平(今蕉岭)、程乡(今梅县)、平远、大埔等县是客家人,与闽之汀州府永定、武平、上杭等县同为客家人,故情感敦睦,相互守望。两方各有嫌隙,互有敌意,纠纷屡起。六十年五月朱一贵(长泰人)与杜君英(潮州客人)在府城相攻,杜君英战败北走,闽客之间气氛紧张,随时会发生械斗……乃创设‘六堆’及设立章程。”^③在清朝,“六堆”客家屡助清廷平乱,而清廷对其也褒奖有加,但感人至深的是乙未抗日。光绪二十一年(1895,甲子纪年乙未),清朝割台湾、澎湖等地予日本,台人群情激愤,誓

^③ 见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策划主办《客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4)。

守台湾以抗日,进士丘逢甲、巡抚唐景崧和总兵刘永福倡立“台湾民主国”。然而,当日军登台不到半月,“总统”唐景崧和“团练使”丘逢甲等纷纷内渡。“六堆”客家在无官府可依的情况下,自己组织全力抗日,在斗六门和六根庄两役及全台抗日最后一仗——火烧庄战役中,“六堆”客家“男执干戈女甲裳”,以死亡 1000 余人及家园涂炭的悲壮牺牲,给进攻台湾的日军予坚决抵抗和沉重打击。至于个人英雄,最突出者当数上杭简氏第 9 世简德润第 17 世孙的简大狮。简大狮,原名简忠浩,生于台湾淡水,去台原籍为与闽西永定一山之隔的南靖梅林长教村(客家村)。《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无比愤慨,曾打算潜入京城刺杀李鸿章,经朋友劝说,才转为组织抗日义民队伍直接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在台湾,简大狮率领抗日义民经常袭击日本军宪警驻所,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经过 5 年之久的艰苦斗争,因寡不敌众,简大师只好回漳州以图再举,但因日寇早已对其恨之入骨,便要挟清政府将其逮捕并解往台湾,于 1900 年 2 月 29 日英勇就义。

包括闽籍客家在内的台湾客家抗日行为,大大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侮辱和渴望统一的正气。就连日本人对此也大为叹畏并对客家刮目相看。日据台湾时期所出的有关日本学者著述,不少都有这方面的记述,如山口县造《客家与中国革命》称:“客家是中国最优秀的民族(按:应为民系或族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都强,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竹越三郎《台湾统治志》云:“客家是台湾最开化、最坚强和最富民族意识而不易统治的民族。”这些认识和评价,可以说是日本人从侵占台湾而与当地客家人的较量中得出的一种叹畏,而这种叹畏的来由,无疑包括了闽籍客家的抗日爱国义举。

二、拓殖台湾经济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史家推断至迟在秦汉就与大

陆有扯不断的关联,而且汉晋以来就有大陆人民陆续东渡登岸,元明开始,台湾列入中国版图,接受朝纲的辐射,从此,福建漳泉人民不断渡台并定居耕种于此。然而,台湾得以大面积彻底拓展和开发,则在郑成功驱荷复台而闽粤移民大举迁台之后,其中闽籍客家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不可低估。

台湾在大陆移民大举渡迁以前,由于孤悬大海,人烟稀迹,到处是丰草茂木,满目荒野,所以,早期的拓荒者“多死于烟瘴,不得归葬家乡。”^①然而,当客家人大量渡台拓垦时,由于闽南人占地理人和之便已捷足先登而居于沿海平原,因而留予他们开垦的地方,多是林荫深翳、烟瘴弥漫的丘陵山地。但终因原乡生计所迫,而台湾又土壤膏腴,雨泽丰沛,非常宜农,所以,不少闽粤客家仍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而毅然渡台,以客家人不畏险难、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凭着丰富的垦殖和农耕经验,硬是在闽南人遗弃的地方开辟出一片片良田和重建起一处处新的家园。

据史籍与有关研究成果表明:仅清代朝隆年间永定入垦台中地区的人氏即主要有:胡永兴率众拓垦胡芦墩岸里新庄(今丰原市胡芦、富春、下街、顶街等里);苏昌龙垦殖后里(今后里乡后里、原里二村);卢祯诚、曾日育等垦荒大里(今大里乡大里、新里二村);卢清杰等开垦阿罩雾(今雾峰乡)^②等等。然而,闽籍客家在明清时期拓垦台湾最著名者当推刘国轩和胡焯猷。

作为功臣良将,刘国轩在驱荷复台中铸成的声名,在其在世时就远播海内外。但英雄就是英雄,刘国轩在拓殖台湾的功名也甚于一一般的垦荒者。据史籍记载:郑经继嗣后,刘国轩率师驻半线(今彰化)、守鸡笼(今基隆),以平北路诸番而求巩固明郑在台的经营。为减少明郑经济对大陆的依赖,他在这些当时明郑用于流放

① 朱维干《福建史稿》(下),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页。

② 陈运栋《客家人》,台湾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41页。

罪人的台湾北部荒野地区实行屯田。^①台湾北部大面积的开辟，不仅加速了与台湾中南部已开发地区联成一体 的进程，还为日后基隆、台北等地的繁荣创造了先决条件。与此同时，刘国轩在拓垦实践中认识到台湾的气候、土壤和排灌极适宜甘蔗种植，于是“建议拓地招垦，以兴糖政，并奖励官兵种植甘蔗，由福建输入大宗蔗苗，广布种植，成绩斐然。”^②刘国轩这一倡导，不仅改变了以往台湾的农作物只种芝麻、绿豆的历史，^③而且还因“每岁所出约六十万篓（每篓约一百七十八斤），全台仰望资生，四方奔走，莫此为甚，故为贸易之大宗。”^④大大搞活了明郑的贸易和经济。当时，台湾出产的蔗糖每年输出 30 万担，除输入大陆外，还远销日本，使其成为与稻米并列的台湾两大经济作物。因此，刘国轩在拓殖台湾方面的功绩，与其在驱荷复台中的作用一样功不可没。

胡焯猷，字攀林，号仰堂，闽西永定下洋中川村人，以生员捐纳例贡，乾隆初年渡海登台，居于淡水兴直堡新庄山脚。当时“兴直堡一带多未辟”，焯猷赴淡水厅请垦，出资募佃，并回永定家乡动员和带领乡亲前往共同垦殖，然后“建村落，筑坡圳，尽力农功。不数年后启田数千甲（每甲为十亩三分一厘），岁入租谷万石，翹然为一方之豪矣。”^⑤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拓荒的杰出代表并大获成功，胡焯猷可谓台湾史上第一人，所以，其英名事迹在台湾人民中长久传颂，两岸特别是台湾有关史书对其也多有记载和评价，如连横《台湾通史》有胡焯猷传，而当代台湾学者郭廷以在其《台湾史概说》中，当叙及乾隆、雍正淡水一带开发的历史原委时，更是着重论述了胡焯猷对台湾北部开发的贡献。

三、传播中华文化

① ④连横《台湾通志》“刘国轩传”。

② 袁克吾《台湾》，厦门大学编印，1951年油印本，第191页。

③ 朱维干《福建史稿》（下），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⑤ 连横《台湾通志》“胡焯猷传”。

台湾在荷据之前，“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荷兰人侵台后，“乃派牧师布教”，授以基督之类的西洋文化，但接受教育者甚少。^① 所以，台湾文明的真正开启，则是在郑成功驱荷复台而大陆人大举渡迁之后移植其所携带的中华文化。这方面，客家人的作用功不可没，而闽籍客家的作为也同样可圈可点。

客家本为中原汉民，其祖先大规模迁离中原和江南而往南方挺进，是从晋唐开始。而这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正走向高度成熟并辉煌灿烂，所以，崇尚文教和耕读并重成为客家人文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早期渡台的闽籍客家特别其文人士子，无不在当地尽其所能、倾其所力地推广这种道德规范，在其所居的台湾每个区片和角落，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使文化荒漠的台湾，开放出一朵朵绚丽的中华文明之花。如乾隆年间入居淡水的永定籍贡生胡焯猷，他不仅在垦殖台湾的业绩中功勋卓著，而且在开启当地文风，发展台湾北地的文教事业中，也同样为世人称道和铭记。据史籍记载，胡焯猷初抵台湾时，北部地区淡水一带的文化教育事业仍然一片空白，他“念淡水文风未启，乡里子弟无可就傅”，以致各地移民为争土掠地而经常斗殴流血，遂于乾隆“二十八年间，自设义塾，名曰明志”，并“捐置水田八十甲余，以其所入供膏火，又延名师教之，”毕业生每期达几十人。这一成绩在古代就是经济较发达地区也是少有。所以，当时淡水厅同知胡邦翰闻其事迹而深受感动，详报有司请改为书院以扩大其功能，发挥更大的教书育人作用。后来，总督杨廷璋还为其立碑纪念。杨在碑文中高度评价了胡焯猷的兴学义举，赞其“标明志之名，冀成致远之器。”兴学重教，功在千秋，“摩义渐仁，山川换色”。胡焯猷在台湾除著田兴学外，还“置香田”于观音山上“建佛寺”。该寺后来成为台湾“名刹”。所

^①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87页。

以,他在当时就被清廷和台湾总督分别授予“文开淡北”,“功资丽泽”的奖匾,成为在台传播中华文明的杰出先驱。^①除胡焯猷外,早期对开启台湾文风作出贡献的闽籍客家士子还有永定籍的胡檀生,他于雍正年间任彰化学官期间,积极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另有连城籍的黄而康,他于咸丰年间赴台湾府任教谕,培养台湾子弟接受中华文化;^②此外,永定籍翰林巫宜福,于道光初年游历台湾时,也在三芝乡等地嘱咐当地民众接受大陆文化,其事迹在《台北县志》和日人铃森清一《台湾旧习俗信仰》诸籍有记,在此不再赘述。

然而,闽籍客家在台湾播种中华文明的贡献,远不止于这些少数的文人士子,而是人人参与、大家实践。众所周知,客家先民南迁是背负着祖宗骨殖辗转迁徙的,这正是中华民族敬祖睦宗、热爱故园和团结奋发的道德风范在客家行为中的典型体现。历史上,客家人不论徙居哪里,都把这种人文移植在哪里,并且靠着这种精神,无论遇到多大艰难险阻都勇往直前。在台湾,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那怕早期渡台者基本都是因生计所迫的目不识丁的贫民和士卒,但他们对祖先和故园的敬恋以及团结乡里的精神,依然是那样执着和强烈。就单一宗族而言,如台湾屏东有座“张氏化孙公分祠”,这是开基并歿葬于上杭而被后世尊称为“鄞(汀)江始祖闽粤江左流传”的张化孙的裔孙,在徙居台湾后仿祖地总祠风貌所建;再如台南的成功路有吴氏大宗祠,据考也是南宋吴氏入闽始祖吴承顺(歿葬于龙岩小池前)的后裔,在渡台后为纪念祖地和先人而留下的文化遗产。^③此外,就反映整个乡里团结友爱而言,在台湾至少在漳化、淡水和台南三地都有定光佛寺庙,这些寺庙都称鄞

① 所引均见连横《台湾通志》“胡焯猷传”。

② 胡以按主编《中川史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③ 龙岩市台办编《寻根揽胜闽西缘》,海风出版社1997年版(清样),第54页。

(汀)山寺和汀州会馆。它们的功能除祭祀神明之外,更主要的则在于乡亲之间联络感情和守望相助。所以,固守和培植着这种精神,客家人尽管在台湾各族群中处于弱势,而且又多居于丘陵山地,但仍然有所作为,并且子孙后代的感情都与祖地紧紧连在一起。

闽籍客家居于闽地西南一隅,在此长期劳动生活,繁衍生息,其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自然难免烙上当地氛围的印痕。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事象,不仅为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再添了一笔,而且也随闽籍客家的渡台而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之中。如文艺方面,在台湾流传的北管、汉剧、山歌、傀儡等等,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折射着闽西同类事象的影子;而宗教信仰方面如彰化、淡水、台北、台南等地客家住区至今仍承袭的“伯公”崇拜和定光古佛信仰,不但其称呼和信徒在大陆基本限于闽西,而且其缘起也出于古代汀州。^① 它们被传于台湾,除满足了早期闽籍客家迁台者的娱乐需求和心灵寄托外,还拓展了客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空间,同时也充实和丰富了台湾文化的内涵。

本文为福建闽台交流协会和闽西客家联谊会联合举办之“闽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1997,龙岩)主旨报告论文,原刊《客家纵横》1997年第四期“闽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专辑”及福建社科联主办《福建学刊》(1998年第二期起更名为《东南学术》)1998年第一期。

^① 见汪毅夫《客家民间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高峻、俞如先《清代福建汀州人入台垦殖及文化展拓》(《福建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和刘大可《关于闽台定光古佛信仰的几个问题》(福建省客家学会编《客家》杂志1994年第4期)等。